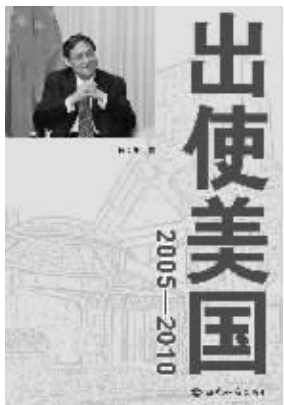


中方以3.5亿美元捐资额加入泛美行



纪实文学



周文重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周文重,祖籍江苏,1945年出生于重庆,幼年随父母迁居上海。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北京对外贸易学院,1973-1975年在英国巴斯大学、伦敦经济学院进修。留英回国后供职于外交部,先后在翻译室、美大司工作;历任驻巴巴多斯、安提瓜和巴布达、澳大利亚、美国大使;曾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本书以白描的手法忠实记录了作者2005-2010年任中国驻美国大使期间亲身经历的十二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历程。

上期回顾

中国加入泛美行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历时15年,其间搁置10年;从2004年重启到最终完成法律手续,也经历了将近5年时间。

入行要价

早在2004年10月,韩国入行程序基本完成后,泛美行管理层表示,中国入行条件可与韩国一致(2亿美元),但美方当时则表示中国捐资额应高于韩国。2006年2月8日,我宴请泛美行新任行长莫雷诺,就中国的入行条件问题做其工作。莫雷诺行长是从哥伦比亚驻美国大使任上转任泛美行行长的,我与他在使团活动上常常见面。熟人见面少了许多客套,果然莫雷诺行长见到我便说,他已不是外交官,说话不需要用外交语言了。我表示,两人相识已久,请他实话实说。莫雷诺行长开出的条件是,美方提出的中国入行条件之一是中方捐资额应高于韩国。他认为,中国入行捐资至少应不低于韩国。

2006年12月首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后,中国入行捐资额问题正式进入谈判日程,谈判进入第二阶段。美方态度趋于积极。

中方综合考虑了我国国情、韩国捐资额等情况,确定了2亿美元的捐资方案。

2007年2月12日,周小川行长致函莫雷诺行长,正式提出2亿美元捐资建议,并表示中方拟于3月19日危地马拉年会期间签署加入备忘录,争取在5月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完成入行。泛美行秘书长表示,2亿美元显然低于普遍预期,数额是关键,如没有共识可不将捐资额写入备忘录。

我随即约见莫雷诺行长做工作。莫雷诺行长认为中方的出价应更具创造性,在支付期限、捐资分配等方面可以更加灵活。莫雷诺行长建议中方多做泛美行成员中大国的事情。

2007年3月危地马拉年会上周

小川行长同莫雷诺行长签署中国入行谅解备忘录,但未提捐资数额。

7月2日,我与泛美行秘书长卡罗斯通电话。卡罗斯通报,泛美行执董会议决定:泛美行将把股份留给中国而不是俄罗斯;中国还应加入泛美行的多边投资基金和投资公司;捐资5亿美元比较合适。泛美行7月3日正式提出5亿美元的要价。

中方坚持同股同价原则,并为此不断做泛美行的工作。10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会见泛美行第一副行长扎里科时指出,中国的外汇储备是用资金购买外汇资产,与财政结余形成的外汇储备在性质上是不同的。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我与美国副财长麦考密克通电话,麦考密克表示2亿美元是不够的。

为讨论解决中国入行问题,2008年1月16日,我、莫雷诺行长和美国副财长麦考密克在美国财政部麦考密克办公室举行三方会晤。麦考密克表示,美方重视中国申请,鲍尔森财长指示,协助中国入行是美国财政部的优先目标之一。美国支持中方捐资2亿美元入行,但其他股东持异议。希望中国入行问题在2008年6月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解决,作为对话成果。

我对此表示感谢,并阐明中方立场。我表示,入行符合中国、有关各国和泛美行利益,是彼此需要、互利共赢的好事,应加快促成,而不宜人为设置高门槛。我重申,5亿美元要价是参照韩国2亿美元捐资水平,并通过比较两国人均GDP、出口总额和外汇储备这三个指标平均后简单推算出来的,不科学、不合理、不公平。韩国系经合组织成员,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富裕程度远超中国。中国经济总量大,但地区和城乡发展很不平衡。中国向其他地区和国家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应是中国力所

能及的。2亿美元是根据中国自身发展状况和同股同价原则提出的合理出价。

莫雷诺表示,泛美行对中国入行总体积极,但同时确实存在复杂性,大多数成员不赞同2亿美元方案。当前中国入行正面临重要机会,双方应各自显示灵活性。此轮谈判应干脆利落地进行,而不能再陷入双方反复讨价还价的境地。麦考密克表示,下一轮谈判应一举成功。中方和泛美行应先就入行问题的捐资计算方法和原则达成共识,然后再讨论具体数额。有关数额应有助于泛美行说服其成员国接受中国入行;在此基础上,泛美行应确保双方顺利达成协议;希望中方在捐资思路更具创造性。泛美行旗下有银行、投资基金和投资公司三个集团,捐资的分配和使用应具有弹性。2008年2月2日,中方同意捐资2.5亿美元,其中5000万美元为特别贡献。2月5日和2月10日我两次约谈麦考密克副财长,催请泛美行对数额的反应。麦考密克说,泛美行方面表示,希望采取净现值计算方法,期限可灵活。报回国内后,国内答复:中方对此不同意,但捐资分配和拨付安排上可以灵活。2月23日,我应约与麦考密克副财长通电话。他表示,泛美行可能不接受2.5亿美元的出价,他建议中方在计算方法上显示灵活,同意净现值方法或其他方法。

2月29日,我、莫雷诺行长、麦考密克副财长再次在麦考密克的办公室会晤。莫雷诺行长表示,中方出价只要以“2”打头,泛美行的执董会就难以接受。3月初,泛美行管理层表示,中方捐资额与各方预期差距较大,4月年会入行的可能性只有25%,泛美行管理层不准备在4月初年会前将中国入行报告提交执董会。3月中旬,泛美行提出3.2亿-4亿

美元的要价,部分执董提出一次性支付3.5亿美元。

大功告成

为了更好地摸清泛美行成员国的真实想法,我委派使馆高级外交官陪同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出席4月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泛美行年会。代表团发现除了委内瑞拉外,其他与会国均避免承诺支持中方目前出价。不少国家表示“同股同价”原则与净现值方法应结合运用。

收到代表团的报告后,国内对捐资进行了调整。5月27日,我再次同麦考密克副财长通电话,表示中方在入行问题上愿意进一步显示出灵活性。麦考密克对此表示深受鼓舞,认为泛美行应迅速做出反应,而不是做做姿态。

5月31日,我出席在哥伦比亚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年会前经停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时,在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官邸会见了莫雷诺行长。我表示,为显示更大的灵活性,中方决定将捐资额提高到3.5亿美元,请莫雷诺行长就此做各方工作,尽快实现中国加入泛美行。莫雷诺对中方所做努力表示感谢,承诺立即小范围咨询主要股东。泛美行成员国对此反应普遍积极。莫雷诺行长事后告诉我,中方调整出价使泛美行成员感到了中方的诚意与热情,是不少成员国转而支持中国入行的关键。6月10日,周小川行长向莫雷诺行长发出中方申请函,正式启动入行程序。在驻美使馆的推动下,泛美行管理层允诺全力推进中国入行程序。9月17日,泛美行执董会通过了向理事会推荐中国加入泛美行的报告。各成员国投票于10月15日截止,无反对票,亦无弃权票,只有个别国家未来得及投票,赞成票占应投票总数的99%,结果圆满。

清末因“浑灾”而引发的一场民变



品读历史



宗承灏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官场史,在漫长的历史中衍生出了独特的官场文化,探讨研究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对当下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书中以中国历史为线索,博采史料,精心编排,真实还原了中国古代官场的本来面貌,展示了古代中国官员的生存状况,尤其揭露了隐藏于其中的灰色地带。

上期回顾

商人与政府、官员在长期的“合作”过程中各取所需、各获其利,形成了一种三方互动的利益捆绑关系。随着“权力经济”体制的长期延续,不断膨胀,也迫使整个社会付出惊人的“制度成本”。

对于古代官家来说,他们最大的威胁并不是民变所引发的社会动荡,而是源于权力体系内部的溃败与腐烂。谁都知道民变是由民怨引发而起的,是民众对不恤民情政府不满所采取的一种暴力行动。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民变毕竟只是一种外在的冲突事件,它对权力制度造成的伤害只能算硬伤,而不算致命内伤。权力内部的溃败正好与其相反,它是社会机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我们打个比方,民变就好像一个有着健康体魄的人,忽然走路摔了一跤,最后骨折了;而溃败就好像一个平日看上去健健康康的人,忽然发现自己体内的癌细胞正在扩散,最后要了自己的命。民变是可以修复好的皮外伤,而溃败却是无法挽救的要命伤。

晚清后期,各地发生的百姓骚动可谓此起彼伏。据史料记载,晚清最后十年发生的民变有史料记载的达数百起,这当中还不包括那些没有记录在册的小事件。有人曾经做了更大范围的统计,得出的结论是至少1300起。这样算下来,平均每两天半就要发生一起。无论是何种统计口径,可以肯定的是: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民变的一个高发时期。

1909年的四五月间,湖南北部永顺地区遭遇特大洪灾,境内的永定、慈利、石门等县成为一片汪洋泽国。这些地区庄稼颗粒无收,受灾百姓达百余万人。北部正闹着水灾,湖南南部衡州、宝庆、长沙地区又闹上了旱灾,粮食收成也是歉收严重,等到粮食上市,价格比常年翻了一番。这种大面积的灾荒,让滨湖地区的灾民都涌入长沙地区以行乞为生,由于大批灾民的到来,长沙四乡吃官府救济粮的灾民越来越多。滨湖地区一直是湖南省的“大粮仓”,粮仓缺粮,受灾百姓都蜂拥至长沙。这

样一来,长沙的粮食也随之紧缺。

受了灾自然就要赈灾,在各地的赈灾中,一向有“清灾”、“浑灾”的说法。所谓“清灾”,也就是地方官在赈灾中能够奉公守法、按章办事,赈款能够足额发到灾民手中,地方灾民得到救济。而所谓的“浑灾”,就是指那些靠着赈灾大发国难财,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湖南地方官府在这次赈灾中表现出来的就是“浑灾”。

首先,官府仍听任周边歉收的省份沿袭过去的办法来湖南地界采购粮食。湖北在1909年湖南罹遭巨灾的情况下,“鄂中大吏犹沿袭往时故事,资湘米以供鄂食”,每月运走粮食10万石以上。自给自足尚且困难,官方这种割肉式的“穷大方”,害苦了地方乡民。

其次,听任那些商绅地主们拿着热钱炒粮食,他们大量囤积,拉高市价。这就导致市面上流通的粮食价格一天一个价。

除了外省和地方商人的双重盘剥,当时的湖南巡抚岑春煊还与日、美、英三国洋行签订了关于运米出境的照约,而且此举居然能够通过清廷外务部的批准,令人费解。这些外国商人在地方官府的庇护下也加入到了这场炒粮运动中,他们诱引本地奸商深入粮食产地,坐地收购,偷运出境的粮食“每月两三千石”。

湖南市场上严重缺粮,可谷米却大量流出境外。巡抚岑春煊利用其巡抚特权,指使亲信分驻长沙、汉口两地,借口粮食全部收为官买,挪用公款抢购囤积,并勾结英国人私运出洋。如此一来,除损害了农民利益外,也损害到了湖南地方豪绅的利益。湖南豪绅便由王先谦领衔先后多次致函岑春煊,要求官府“禁运”。岑巡抚不仅没有禁止运谷米出境,反而提出“先办义粟”。同时借口

办“义粟”,劝乡绅们从大局出发,为地方官府买单。王先谦要求官府开仓平粟,巡抚岑春煊当然不会同意地方豪绅的要求,因为“平粟”就意味着官方要让出绝大部分利益给地方豪绅。

从表面上看,乡绅要求巡抚岑春煊“平粟”有谋取私利的因素在里面。但毋庸置疑的是乡绅这次也有老百姓形象代言人的意思在里面,为民请愿。可在以巡抚岑春煊为代表的官方人士眼中,乡绅们替老百姓出头,是在与官府争夺基层社会的控制权。

1909年秋,省咨议局提出了全面禁运的议案。在全体士绅及藩司的联合压力下,巡抚岑春煊才算勉强同意“禁运”。禁运的告示发布后,各国驻华使领馆并不买账,他们搬出1902年中英商约的规定,宣称在禁令公布21天后方可生效。也就是说,在这21天内,他们可以加足马力,为所欲为。那些商贩互相勾结,争相购运,整个湖南粮食市场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也就是在这短短的一二十天时间里,出口的粮食达到了数百万石。

洋商将谷米大量运出境外,商绅地主也在拼命囤积谷米。这种互为表里的利润盘剥,使湖南粮荒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谷价的直线上涨,使本就挣扎在贫困线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彻底走向破产。这时候,周边受灾的百姓大量涌入长沙城内,使得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像坐在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上,随时有爆炸的可能。很多吃不上饭的饥民为了能够生存,往往会铤而走险。

1910年4月11日,长沙市面上的米价已经突破了每石8000元的大关。也就在这一天,在南门外靠挑卖河水营生的农民黄贵荪,将自己一天所得的80文钱交给妻子,让她买

些米回来下锅。毕竟好几天,一家老小都没有沾一粒米了。在交易过程中,米店老板以其中有几文是烂钱为由,不肯收。没办法,黄妻只好折返回家换钱。可等她回来的时候,米价已由刚才的每升80文涨至85文了。

本来因为家乡受灾来长沙城寻活路的黄贵荪一家四口人不但没有寻到活路,却在不知不觉中遭遇了生存的“血线”。黄家人这时候已经饿了几天,好不容易才挣了几个小钱,却连一升米都买不到,黄妻在忧愤之下投潭自尽。等到黄贵荪辛苦一天返家,不见妻子和儿女,打听之下才知道去了妙高峰下的老龙潭。当黄赶到时,却只见两个孩子站在潭边啼哭,妻子已投潭而死。悲痛至极的黄贵荪抱起两个孩子也跳入潭中,步了妻子的后尘。一家四口就这样绝望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黄贵荪是受灾农民,长期以来被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民,土地带给他们沉重的赋税,也带给他们一些微薄的活命之资。可如今一场天灾,他们连最起码的生存需要都化为泡影。在那些饥寒交迫濒临死亡者看来,寥寥衣食就意味着性命本身,绝非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和等身之物中间的分界线就是“命一物等价线”,一旦突破了这条线,以命换物就可视为有利可图的交换。突破越深,交换之利越大。突破越广,搏命之人越多。“血线”之下的人类行为特征,就是追求生存机会的最大化。

这场悲剧性事件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每个人心头,涌入长沙城里和黄贵荪同样身份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口耳相传,人们心头的愤怒像瘟疫一样迅速传遍了长沙城内外。一场大规模的危及长沙公共安全的重大风暴即将来临,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